



清华国学丛书

邹东廓年谱

张卫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清华国学丛书

邹东廓年谱

张卫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邹东廓年谱/张卫红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

(清华国学丛书)

ISBN 978-7-301-23264-4

I. ①邹… II. ①张… III. ①邹东郭(1491—1562)—年谱
IV. ①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585 号

书 名: 邹东廓年谱

著作责任者: 张卫红 著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264-4/B · 11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A5 16.5 印张 39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书为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思想、讲学与乡族实践——邹东廓与江右王学的开展”(11YJA720038)课题的部分成果,并得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出版资助,特致谢忱!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

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所指向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

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1年1月

《邹东廓年谱》序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王阳明先生门下高弟。阳明死后，门人弟子继续发扬师教，推广良知之学，其中以江右的邹东廓、浙中的钱德洪、王龙溪最为著名。钱德洪、王龙溪嘉靖初随阳明讲学山阴，又曾参与四句教的讨论；阳明逝去后在传扬阳明学的方面，二人皆四处讲学，随地结会，不遗余力。故后人论及阳明学往往以钱王二人为代表，这也是有其理由的。其实，在阳明生时，在徐爱死后，门人中独对邹守益另眼相看，如《明儒学案》叙：“又见文成于越，留月余，既别而文成念之曰‘以能问于不能，谦之近之矣’。”而阳明死后，海内也皆以邹东廓为王门的首领，此见于湛甘泉之说可证。而且，邹东廓为学“一尊师说”，力遏玄虚之论，不仅在王门的领袖地位甚高，其学术之正，在王门中也非他人可以相比。嘉靖时代，王门内外都认为邹东廓代表了王学的正传，明末学者也依然如此，如黄宗羲说：“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所以邹东廓在王门中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王门后学的研究，在十余年中，有关王畿、罗汝芳、罗念庵、聂双江的专门研究，都有了较好的成果，其他人物、专书的研究也在蓬勃开展，惟独邹东廓的研究一直未见出现有深度的成果。有见于此，我力主卫红承担此项

研究,以弥补王学研究的一大不足。卫红的博士论文研究罗念庵,她对念庵的研究可谓深造有得。2006年夏,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她即来北大,从事于博士后研究。因其博士论文完成较好,体贴较深,又能专心学问,所以我就建议她的博士后研究以邹东廓为主题。盖东廓、念庵皆是江右阳明学者,思想关注和论学话语颇多重合,尽管主张并不相同,故而此项研究对卫红而言,既是其江右王学研究的扩大延伸,又是一个关乎王学研究全局的新挑战。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建议不啻是鼓动卫红在博后期间完成另一篇博士论文,难度是相当大的。但卫红欣然接受,在两年博士后期间,专注沉潜,顺利完成了邹东廓研究的出站报告,她到中山大学任教之后又细心撰写东廓年谱,相关研究日益深入。此时我从北大转到清华,便邀她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以完成东廓年谱的结撰。今其全稿已经完成,列入清华国学研究丛书即将出版。

其实,在阳明学传统之中,年谱之作,也是受到重视的。王阳明去世后,同门即谋划修撰其年谱,其分工方法是由同门各分年分地搜集资料撰写成稿,而“总裁于邹守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邹东廓在王门的领袖地位。但阳明死后将近三十年,其年谱仍未见编成,此即所谓“三纪未就”。于是邹东廓乃遗书钱德洪而督促之。且东廓晚年因见阳明年谱迟迟不能编就,便亲自主导编绘《王阳明先生图谱》并刻石于吉安,其中文字多为东廓所作。东廓编此图谱的意旨可见于王宗沐为图谱所作序:“阳明先生,天挺间出,……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之徒。今没才三十年,学亦稍稍失指趣。高弟安成东廓邹公辈,相与绘图勒石,取先生平生经历之所及与功用之大,谱而载焉。……以余之尤有待于是,则后世可知,而邹公之意远矣。”这说明,针对阳明死后,王门弟子“各执所闻以立教”,“未及一

传而淆言乱众”的乱象，邹东廓欲通过年谱图谱之作，宣明师门本旨，以统一认识，这也是邹东廓身任“王门正脉”的自觉的体现。

邹东廓对王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坚守阳明的正传，而且在于由他推动的吉安地区的王学讲会、乡会成为嘉靖时代最大规模的地区讲会网络，成为嘉靖时代王学会讲的中心和典范，对推动阳明学的民间化和跨地区交流起了重要的领率作用。又由于东廓居乡时间甚久，长期参与乡里教化和乡土社会的建设，与地方政治互动密切。基于此种原因，卫红此书注重梳理邹东廓的思想与社会实践的一体性，以此为主线，在对其思想发展加以叙述外，对邹东廓推行讲会、致力乡族建设和化乡实践的活动作了全面整理，颇为细致地展现了江右王学与地方家族、地方政治的互动关系，也体现出她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思想与社会文化的交互关联。这对以往阳明学研究集中关注思想家的思想、而较忽略阳明学者的社会历史活动，有明显的补益作用。

此书在史料整理方面收获亦颇丰，书中按语的人物小传与简介中，有百余位不见于《明儒学案》的记载，这些人物多为功名不高或布衣出身，是地方上活动的草根学者或年高望重的乡老，而他们正是阳明学在地开展的主力参与者。为收集资料，作者曾多次到吉安地区进行调查，从东廓后人家族中收集到邹氏家谱六种，其中有传世文献稀见的大量邹氏家族人物的传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由于史料收集甚详，故使得本书对谱主生平行事的梳理，对人物、地名、书院的简介，对相关文献的征引，其系统与丰富，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邹氏年谱之作，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总之，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深入理解阳明学，尤其是阳明学及阳明学者的儒学思想与社会文化实践的密切关联，对促

进哲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视野的融合,都有其特别的贡献。特向读者推荐。

陈 来

2013年7月于清华大学

邹东廓学行简述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明孝宗弘治四年二月初一（1491年3月10日）生于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北乡澈源里。父邹贤擅治《春秋》，至东廓孙辈皆以《春秋》经取得科举功名，澈源邹氏遂以此成为当地望族。东廓少而颖敏，年十七中乡举，始授徒讲学；年二十一中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同年以父病乞归养，兼之丁忧，至嘉靖二年始北上复职。时大礼议起，先后三次上疏指摘桂萼、张璁等人，忤世宗，下锦衣卫狱，寻降为广德州判官。三至六年谪官广德期间，重教兴学，广行善政，建复初书院聚讲。七至九年，转任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南京期间，与湛若水、吕柟等名士主盟讲席，并与王门同道聚讲，一时讲学之风大盛。十年，以病不待报而归里，遭内阁首辅张璁作梗，十三年被革职，十七年始起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十八年，以多人举荐，召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读，同时召为东宫讲官的尚有徐阶、罗洪先等阳明学者。在京一年间，与王门同道聚士子讲学，兴起甚众，招致反感阳明学的内阁首辅夏言之不满。十九年三月，升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南京院事，以升职名义使其远离权力核心。数月后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任职期间，不顾夏言反对，讲学不辍。二十年夏，世宗以九庙灾事件诏百官自陈，东廓疏陈上下交修之义，再忤世宗，夏言趁机构罪，遭落职闲住，此后再无出

仕。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于家中端坐而逝，年七十二。隆庆元年追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庄。

观东廓一生仕途，可谓“三十年中，三仕三已，禄食之日，不满一纪”^①，且遭一次贬官、两次革职；每一任职“未尝三年淹”，其自嘲“真所谓山林局也”^②。其成就不在朝野之中，而在庙堂之外推动王学的思想与实践，以此推为王学宗子、江右王学之首。

东廓于正德十四年至江西赣州谒见阳明，初为父求墓表，无意拜师。时值王学在江西初成气候，阳明公务之余与士子聚讲不辍，门徒日进。论学间，东廓提出困扰多年的《大学》、《中庸》宗旨不一的问题，阳明以其浑一性思路将格物、致知、戒惧、慎独全都收归于“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致良知教中，从而学庸宗旨合一，戒惧即是通达良知圣境的工夫方法。东廓豁然相契，为学宗旨从此确立，为最早拜入阳明门下的江右弟子之一。此后至阳明逝世的九年间，东廓有较多亲炙机会，不仅有师生共赴义军、平定宸濠忠泰之变的患难经历，而且见证了其师在平濠之变、王学遭禁、谤议不断的百死千难险境中冶炼良知学的全过程，耳濡目染“只此良知无不具足”^③的高明阔大境界，无论是圣贤人格的感染力还是对阳明思想的准确把握，都有莫大裨益。阳明对东廓亦十分器重，曾以孔门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比之；同门更赞其“一惟

① 邹德涵：《文庄府君传》，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卷二七，1365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简欧约庵司空》，《邹守益集》卷一二，602页。

③ 按此是正德十六年阳明致书邹东廓之语，见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三四《年谱二》，1278页。

师说之守”^①，有“师门已共推曾子，函下谁当像伯淳”^②之喻。

在学术主张上，东廓提揭戒惧说。其思想脉络本诸阳明学庸合一的思路，上溯周濂溪《通书》“无欲”、程明道《定性书》“定性”、“大公顺应”说会通其戒惧说，以取得学脉上的合法性，下依自得，将《中庸》“戒惧以致中和”转化为“戒惧以致良知”的义理构架，学术宗旨总归为戒惧说。就工夫路径而言，有“戒惧于事、戒惧于念、戒惧于本体”的三层次论说。东廓早年在形下念虑上用功，嘉靖七年，他在王门同道的论学启发下醒悟戒惧于良知本体方为究竟工夫，方能“念虑事为，一以贯之”^③。然与王畿之“觊体承当”^④、“一了百当”^⑤的顿悟顿修路径不同的是，东廓和多数江右诸子则强调，著力于本体的同时仍须重视扫荡私欲的工夫历程以“复本体”，故常以“瑟僂之学”^⑥申明其顿悟渐修的工夫特色。戒惧说之义理证成，可从戒惧之本体、戒惧之工夫内容、本体与工夫之关系三方面来陈述。与阳明（晚年）及王畿等不同的是，东廓对良知本体的界定绝无“无善无恶”、“不学不虑”、“虚寂”等具有佛老色彩、偏于“无滞”境界的字眼，而是在认肯良知发用具有无执无滞之自由境界的同时，偏重规定良知之为“至善无恶”，以凸显其道德价值之实存义；为“上帝降衷”、“帝规帝矩”，以凸显其为先天道德准则的规范义和超越义；为“精明”而非“虚明”、“虚寂”，以凸显其明察万物的觉照义和警惕义，从

① 王畿：《邹东廓先生续摘稿序》，《邹守益集》卷二七，1348页。

② 邹德涵：《文庄府君行略》，《邹守益集》卷二七，1366页。

③ 《录诸友聚讲语答两城郡公问学》，《邹守益集》卷一五，734页。

④ 《答谭二华》，《龙溪王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98册）卷一〇，453页。

⑤ 《三山丽泽录》，《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257页。

⑥ 《复濮致昭冬卿》，《邹守益集》卷一一，537页。

而更偏重言良知之“有”与超越性,彰显良知之为道德实践最高目标所具有的内在严格和践履工夫之必要性。与阳明、王畿等范围三教的态度相比,具有更为严格的儒家立场。相应地,致良知工夫便是严肃谨慎的戒惧之功:由形上本体直贯形下日用,于内在心体戒慎恐惧,贯通于外,即是爱亲敬长、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外在仪节,体用内外兼该,正面充拓良知与负面防范气禀私欲并行不悖。其工夫之体用观也与阳明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思路一致,主张工夫形式与本体的作用形式一致,以良知是寂感动静合一之本体,戒惧工夫即无分于寂感动静。更进一步,本体内容亦与工夫内容一致:以良知具有精明、警惕、规矩的本质内容,相应的工夫便是主敬、戒惧、不逾矩。东廓常以“戒惧真体”^①、“工夫本体通一无二”^②来强调惺惺警惕的工夫实践为良知学的首出意义。以上诸义在阳明那里大都有来源依据,其为学风格、个人气象、学术地位都堪比孔门曾子。^③尤其在阳明后学分化变异时,他对主张“良知自然现成”的泰州王学、以聂豹为代表的归寂说、以王畿为代表的“四无论”等各家主张可能出现的偏离之弊均有纠正。其学理之正统性以及救弊补偏之功,是备受称道的基本原因。此外,东廓为首的江右诸子大都走收摄心体、笃实用功一路,其超越性、笃实性进路到刘宗周那里达到了高峰,归显于密,建立了精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工夫方法。尤其东廓的戒惧说与刘宗周的诚意慎独之学联结更密,这是刘宗周赞其得“师门本旨”^④、黄宗

① 《答东山诸友》,《邹守益集》卷一六,758页。

② 《答詹复卿》,《邹守益集》卷一三,650页。

③ 唐君毅云东廓之学“与孔门曾子之学最近”。见《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唐君毅先生全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卷一九,384页。

④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师说》,8页。

羲誉其为王学“宗子”^①的又一学理因素。

邹东廓之于阳明学的另一贡献,在于他以阳明学为核心的讲学活动和乡族实践,此于学术之传播居功至伟,也是他冠为江右诸子之首的另一原因。阳明学以非官方的讲学形式在地方开展,除须有著名学者倡导以吸引思想受众外,还须官府和地方势力的支持。东廓虽去位在乡,然以其学术地位、仕途背景而在士林和地方社会拥有崇高誉望;且“性慈质重,蔼然春温”,^②人缘甚好,交游广泛。笔者曾统计与东廓交往的江西省、府、县级官员多达115人,参与讲会或有学术往来者占84人。这个数量是其他江右学者所无法相比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官方的学术辐射力之广。就地域文化而言,吉安府自宋以来一直是簪纓之族累世聚集的地区,故学术的传播也与宗法世族社会结合程度最深:阳明学通过宗族内部交流及宗族间的联姻、往来等关系,得以在地方传播。邹东廓家族即是一典型:其讲学场地如东廓山房、东阳行窝、连山书院、九峰庵等都距其家族居住地不远,以便利在家族弟子中传播学术;当地以教化百姓为目的的乡会也为东廓所重视,他曾三次奔赴南乡的舟湖会,“诸乡老携子姓咸集,室隘不能容旋,结棚为讲所……遂成一段奇事”^③。其子义、美、善,孙德涵、德溥、德泳(义、美为举人,其余均为进士)均纘承家学,祖孙三代主盟青原、复古、复真、东山等大型讲会前后六十余年。邹氏家族与其他安福阳明学者家族联姻的情况更是数量极众。总之,东廓具备了诸方面的资源和人望,堪任学术领袖。

① 《明儒学案》卷一六,《邹东廓本传》,334页。

② 邹德涵:《文庄府君传》,《邹守益集》卷二七,1364页。

③ 《简诸乡老及同游四首》,《邹守益集》卷二六,1265—1266页。

东廓虽久居乡里,然“一岁之中,家居者鲜”,^①“无一日众不与聚”^②的讲学活动是其日常生活。据本书附录《邹东廓讲会、游学活动一览表》所作统计,东廓召集或参加的跨地域、人数众多的大型讲会有:青原会(常会)、崇福寺会(1535)、复古书院会(常会)、南昌贡院会(1538)、白鹭洲书院会(1557)、龙华寺会(1548)、冲玄会(1549)、闻讲书院会(1560)、宜春台会(1550)、斗山书院会(1550)、水西会(1550),计11个,一般地区性的讲会计71个(含非常规的小型聚会数十个),合计参与讲会82个,这一数字与《东廓邹先生传》所载“常会七十会,聚以百计,大会凡十会,聚以千”^③大体一致。讲学地点以安福、吉安地区最多,兼及江西阳明学活跃的九府十几地,仅南康、南安、建昌三个偏远地区及临江府未见其活动;兼之南京、湖广、浙江、福建一带的讲学活动,影响辐射东南数省,“及门之徒盖数千人”。^④王畿论当时讲学之风莫盛于江右,“而尤盛于吉之安成,盖因东廓诸君子以身为教,人之信从者众”。^⑤王时槐谓东廓的学术贡献:“盖阳明王公之学盛于东南,实赖先生之力也。”^⑥相比于吉安阳明学者之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等人,惟东廓居乡时日最久,主持、奔走于各讲会最勤,吉安府成为王学讲会的极盛之地,东廓可谓功莫大焉。因此,他抵制虚谈、笃实用功的学风也塑造了江右讲会的整体风气。

① 《简复董生平甫》,《邹守益集》卷一一,573页。

② 耿定向:《邹文庄公年谱序》,《邹守益集》卷二七,1356页。

③ 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邹守益集》卷二七,1391页。

④ 邹德涵:《文庄府君传》,《邹守益集》卷二七,1365页。

⑤ 《漫语赠韩天叙分教安成》,《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六,592页。

⑥ 王时槐:《东廓邹先生守益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七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529册,117页。